

# 金陵大学的经费来源与运作研究(1910—1949)<sup>\*</sup>

蒋宝麟

**内容提要:**金陵大学是1910年由南京三所基督教书院合并创办的教会大学。作为中国的教会大学,金大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合作差会、国内外的捐款、学生学杂费与政府补助。至1949年,差会拨款始终是金大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是该校保持长时间稳定的经济保证,并体现该校的基督教性质。但随着金大“中国化”与“世俗化”程度的愈益加深,中国政府、团体企业和个人对其捐助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经费渐超美国。政府的补助经费往往体现实效性与导向性,促使教会大学的发展方向符合国家需求。这对金大的生存与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限制了校方的规划自主性。

**关键词:**金陵大学 经费来源 差会 政府补助经费

近代中国三类不同性质的大学——公立大学(含国立和省立)、国人自设的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的经费来源渠道各不同。除了一般性的学生缴费及其他杂项收入外,教会大学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合作差会、国内外的捐款、学生学费及杂费与政府补助。教会大学的经费收支方式对此类学校相对稳定的治理之道有莫大关联。

当下,国立、私立(国人自设)大学史在教育经费研究上取得较大突破,包括中央—地方政府财政关系与国立大学经费来源的复杂关系,<sup>①</sup>私立大学内部的经费收支运作中商业化、社会化与政治性的平衡,<sup>②</sup>以及抗战时期私立大学改国立过程中的经费来源<sup>③</sup>等议题。虽然近几十年来,海内外关于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十分繁盛,但其中的教会大学经费问题研究却相对冷清。<sup>④</sup>这在很大程度与教会大学财务制度复杂,经费渠道中外双重,收支数据既多且散有关。不过,教会大学财务制度、合作差会拨款机制以及向南京政府立案后国家经费补助与大学内部治理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本文在充分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金陵大学档案全宗”与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藏“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档案”(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的基础上,对1910至1949年间金陵大学(以下简称“金大”)的经费来源与运作问题进行系统

---

[作者简介] 蒋宝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200235,邮箱:mhjiangbaolin@163.com。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末新式学堂与近代中国教育财政的起源研究”(14CZS044)阶段性成果。本文系《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合办之第一届中国经济史青年学术研讨会(2018年4月13—15日)参会论文,承仲伟民教授、梁晨教授与匿名评审专家提出宝贵修改建议,一并致谢!

① 蒋宝麟:《财政格局与大学“再国立化”——以抗战前中央大学经费问题为例》,《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张静:《国立大学与国民政府——以抗战爆发前浙江大学校长更迭为主线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4期。

② 蒋宝麟:《学人社团、校董事会与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治理机制——以上海大同大学为中心(1912—1949)》,《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③ 韩成:《抗战时期的部校之争与政学关系——以私立大夏大学改国立风波为中心的研究》,《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1期。

④ 目前相关研究仅有刘家峰《齐鲁大学经费来源与学校发展:1904—1952》(章开沅主编:《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1—130页)、彭敏淑《为国育才 自强不息——抗日战争时期的福建协和大学(1938—1945)》(张宪文主编:《民国研究》总第23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7—95页)、徐海宁《中国近代教会女子大学办学研究——以金陵女子大学为个案》(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7—202页)。

研究，并加深对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经费问题的整体认知。本文关注点有二：一是经费的不同来源主体与金大办学取向的关系，二是政府的经费补助对金大产生的多重影响。

## 一、金陵大学的财务管理制度

金陵大学建立于1910年，由美国的美以美会（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基督会（Foreign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和长老会（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合作创办。3个差会在美国合组的金陵大学托事部（Board of Trustees），是学校最高治理主体。从创校到1927年底完成改组，金陵大学的财务由托事部负全责。托事部的职责之一就是持有金大拥有或借来的财产，投资和管理基本金。<sup>①</sup>所以说，金陵大学校产的所有者是托事部，而非3个差会共有。托事部负责统一收集各项国外拨款，包括基本金利息、各差会拨款、差会教师薪水及其他国外机构提供的基金和捐款，按照金大的预算划拨给南京。

此外，托事部负责制定学校的年度预算。在最初的制度设计中，南京理事会（Board of Managers）的责任是向托事部负责保持收支平衡和分配来自于任何渠道的经费；其义务是负责管理来自于托事部的经费。<sup>②</sup>不过，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托事部和理事会的经济责任关系有所调整。

由于理事会在南京，对金陵大学的经济状况和收支情况更熟悉。所以在创校后不久，托事部明确规定：理事会可以拟定金大每年的预算，托事部有权赞成、修改和批准各年度预算，没有托事部的批准，大学不能签订任何财务性质的契约；如遇紧急情况，经费突发短缺，托事部需承担弥补经费之责，理事会应与托事部齐心协力增加经费。理事会应尽全力吸引中国人为金陵大学提供地产、设备和经费。<sup>③</sup>1925年修正通过的《金陵大学细则》（By-laws）规定，理事会将所有渠道来源的经费支出情况对托事部负责，代表托事部对所有在中国的经费和校产的取得、管理和执行负责，每年向托事部递交预算草案以获批准。<sup>④</sup>这就意味着理事会在金大的预算拟定和执行上有更大的权力。年度预算每年至少进行两次修订，由理事会执行委员会负责，涉及托事部提供的特别经费，由托事部批准。<sup>⑤</sup>

学校的年度常规性支出由理事会执行，特别性支出（如建筑费）须由托事部批准。例如，在1915年3月30日的托事部会议上，关于建造科学楼、学生宿舍和教堂，理事会请示托事部并求款，托事部批准授权理事会建造，并落实宿舍、教堂和之前的行政楼建造经费。同时，理事会要求将预科（High School）的露天体育场的建筑经费增加3 000美元，托事部决定向理事会索取金陵大学当前所需的详尽清单，包括新建建筑、设备和教职员，如此托事部可以对金大当前各种所需作出明智的决议。<sup>⑥</sup>

1927年底，金陵大学为了向南京国民政府立案而进行改组。<sup>⑦</sup>托事部改组为创始人委员会（Board of Founders），理事会改组为校董会（Board of Directors）。按规定，创始人会依旧是金陵大学校产和基金的所有者。新的校董会对金大的经济负全责，向创始人会报告创始人会提供基金

<sup>①</sup> 1909 *Proposed Constitu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Archives, Microfilm, Reel 55. Box 188, 以下简称“UBCHEA”。

<sup>②</sup> 1909 *Proposed Constitu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UBCHEA, Reel 55. Box 188. Folder 3315.

<sup>③</sup> *Minutes of the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January 27, 1912)*, UBCHEA, Reel 55. Box 188. Folder 3316.

<sup>④</sup> *By-laws; Minute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February 25, 1925)*, UBCHEA, Reel 55. Box 188. Folder 3316.

<sup>⑤</sup> *Meeting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Board of Manager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November 11, 1922)*, UBCHEA, Reel 58. Box 192. Folder 3335.

<sup>⑥</sup> *The Semi-Annual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March 30, 1915)*, UBCHEA, Reel 55. Box 188. Folder 3316.

<sup>⑦</sup> 详见蒋宝麟《20世纪20年代金陵大学的立案与改组》，《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4期。

的用途。<sup>①</sup> 所以在财务经费事项上,校董会拥有更大的权力。金大的年度决算由创始人会所指定的会计师稽核。<sup>②</sup>

托事部及其后的创始人会设有司库(Treasurer)1名,负责保管学校所拥有的基金和证券。<sup>③</sup> 理事会设司库1名,同时担任学校的司库,在托事部的领导下负责经费的收支,负责所有金大的本地收入(包括学费、学生缴纳的其他费用、农场和工场产品的收入等),负责建立各种收入的分类帐目,保证专款专用。<sup>④</sup> 第一任理事会及学校的司库是米尔沃德(W. Millward)<sup>⑤</sup>,1914年起斯特华德(H. B. Steward)、罗斯(G. M. Rosse)、毕曼(Beaman)、伍恩(Lewis H. Owen)先后任该职。金大改组之后,毕律斯(Elsie M. Priest)从1927年底起长期担任校董会司库。<sup>⑥</sup> 毕律斯同时担任学校的会计主任(金大立案后改称“会计主任”)。金大的财务管理系统仅对托事部(创始人会)与理事会(校董会)负责。用校长陈裕光的话讲,金大的经济命脉掌握在美国教会手里。<sup>⑦</sup>

## 二、合作差会对金陵大学的经济支持

在办学初期,美以美会、基督会和长老会3个创校差会各向金陵大学提供价值40 000美元的财产或基本金,提供3位教师的薪水,每年拨款2 400美元。此后,提供教师增至4人,每年拨款增至3 000美元。到1920年,各差会提供教师增至5人,其中有一人专门分配给农林科。到1922年,年拨款增至4 000美元。<sup>⑧</sup>

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金陵大学的师资、设备和经费需求不断增加。同时,金大的办学层次和成绩也吸引其他差会参与其中。南浸信会(The Foreign Mission Board of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南长老会(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U. S.)、监理会(The Board of Missions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和北浸礼会(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先后加入金陵大学,为学校提供基本金、年拨款和教师薪水。<sup>⑨</sup> 1917年医科停办,南浸信会、南长老会和监理会随之退出。美以美会、长老会和基督会与金大是为“完全合作”(Full Co-operation)关系,其他后加入的差会为“部分合作”(Partial Co-operation)关系。

1925年,根据此时该校院系规模和经费需求,《金陵大学细则》规定“完全合作”的基础是:(1)提供不少于45 000美元的财产或基本金;(2)提供5名教会教师;(3)每年拨款不少于3 300美金。另外,规定“部分合作”的基础是:(1)在理事会中拥有1名代表,并在托事部中拥有1名代表的差会,须提供不少于10 000美元的财产或基本金,2名教会教师,以及每年拨款至少1 000美元;(2)在理事会中拥有1名代表,并在托事部中拥有1名代表的差会,须提供不少于20 000美元的财产或基本金、3名教会教师以及每年拨款至少2 000美元。<sup>⑩</sup>

<sup>①</sup> *Constitu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April 22, 192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私立金陵大学档案649—2296。下文引用简称“金大档”。

<sup>②</sup> 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101页。

<sup>③</sup> 《金陵大学“托管会”(创建人会)细则》,《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页。

<sup>④</sup> *University of Nanking, General Regulations*,金大档649—2296。

<sup>⑤</sup> *Minutes of the Eighth Meeting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Board of Manager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Oct. 25th, 1910)*, UBCHEA, Reel 57. Box 191. Folder 3331.

<sup>⑥</sup> *First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November 29, 1927)*, UBCHEA, Reel 58. Box 192. Folder 3343.

<sup>⑦</sup> 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金陵大学南京校友会编:《金陵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册(1888—1988)》,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sup>⑧</sup> *Agreement betwee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the Board of Founders*,金大档649—2295。

<sup>⑨</sup> 南浸信会、南长老会和监理会仅参与金陵大学医科的办学合作,1917年医科停办后,这3个差会与金陵大学不再有合作关系。

<sup>⑩</sup> *By-laws; Minute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February 25, 1925)*, UBCHEA, Reel 55. Box 188. Folder 3316.

具体而言,金大来自合作差会的经费主要有 3 方面:一是差会拨款 (Mission Board Appropriations),即各合作差会每年提供的固定经费;二是差会薪水 (Mission Board Personnel),即各合作差会承担派出教职员的薪水;三是基本金利息 (Endowment Interest),即各合作差会提供之基本金(包括动产与不动产)每年产生的利息或收益。详见表 1。

表 1 金陵大学历年收入中的差会拨款及基本金利息 单位:元

时间	基本金利息	差会拨款	差会薪水	差会总拨款	差会总拨款占 总收入百分比(%)	总收入
1912	0	—	—	17 863.78	42.81	41 729.39
1913	0	22 519.68	3 732.32	26 252.00	38.54	68 109.79
1914	0	—	—	15 166.64	10.26	147 856.98
1915	0	—	—	55 083.55	28.51	193 199.87
1916	0	—	—	72 508.07	30.81	235 349.74
1917	0	—	—	62 765.29	15.62	401 830.34
1918	0	—	—	35 410.25	10.15	348 791.55
1919	0	—	—	85 078.18	22.87	371 954.84
1920	11 243.77	65 767.69		77 011.46	13.94	552 311.34
1921	56 729.34	54 690.25		111 419.59	22.66	491 797.62
1922/1—6	12 673.23	7 236.00	24 950.00	44 859.23	23.97	187 171.07
1923/1—6	10 375.00	12 000.00	29 095.00	51 470.00	27.46	187 411.25
1923—1924	18 099.68	27 000.00	61 826.90	106 926.58	34.91	306 308.12
1924—1925	19 030.88	27 000.00	64 719.80	110 750.68	36.29	305 209.96
1925—1926	21 364.52	27 000.00	64 621.09	112 985.61	30.44	371 213.76
1927—1928	19 000.00	9 000.00	40 040.00	68 040.00	27.63	246 293.00
1928—1929	32 400.00	69 980.00		102 380.00	57.46	178 179.00
1929—1930	46 457.20	13 460.00		59 917.20	—	—
1931—1932	18 900.00	36 395.00	42 133.00	97 428.00	31.15	312 798.54
1932—1933	50 857.55	16 142.45	47 607.30	11 4607.30	12.29	932 857.04
1933—1934	35 561.79	14 808.13	46 370.16	96 740.08	9.94	973 339.35
1935—1936	31 862.65	48 879.80		80 742.45	8.39	962 545.59
1941—1942	357 479.05	180 637.38	42 999.99	581 116.42	9.72	5 979 720.93
1942—1943	1 265 904.24	211 508.70	45 333.30	1 522 746.24	14.47	10 525 261.86
1943—1944	298 509.60	268 499.93		567 009.53	2.24	25 282 513.66
1944—1945	6 755 529.00	1 099 999.96	2 129 062.50	3 229 062.46	2.91	111 122 736.79
1946—1947	333 876 900.00	125 097 000.00	69 412 000.00	528 385 900.00	18.20	2 903 139 646.37
1947—1948	4 183 734 800.00	5 004 216 000.00	4 032 000 000.00	13 219 950 800.00	19.60	67 432 649 654.73

资料来源:金陵大学历年财务报告及决算表,UBCHEA, Reel 90. Box 230. Folder 3886—3891;1922 年上半年数据见金大档 649—2389;1923 年上半年数据见金大档 649—2383;1935—1936 年度数据见金大档 649—2389;1941—1942 年度数据见金大档 649—2384。

说明:单位元,不同时期使用不同货币。1933—1934 年度前为墨洋 (Mex.),1933—1934 年度起用银元,1936—1937 年度起用法币。金大自 1921 年起实施预算财政年度制,即从当年的 7 月 1 日至次年的 6 月 30 日,见历年预算表,UBCHEA, Reel 90. Box 230. Folder 3882。“差会总拨款”项数额为“基本金利息”和“差会拨款”“差会薪水”两项数额相加之和。1927—1928 年度所列为截至 1928 年 2 月收入统计数,不含附中收入;1928—1929 年度所列为截至 1929 年 2 月统计数,不含附中收入;1931—1932 年度所列为截至 1932 年 4 月收入统计数,不含附中收入。抗战内迁时期金陵大学总收入不含南京部分(即南京校园、南京金大附中及鼓楼医院等机构)的收入。

差会拨款、差会薪水和基本金利息是金大最稳定的经费来源。特别在办学初期,此三项是该校的重要收入。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至抗战时期,历年差会总拨款占金大总收入之比基本维持在一成左右。这是由于金大办学规模扩大和声誉日隆,其经费渠道日益拓宽,经费来源名目日增,计有:美国方面的赈余基金(Famine Fund)、霍尔基金(Hall Fund)和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资助或基金收益;中国方面教育部补助、各地方政府合作研究项目及各类捐助;中英、中美庚款等(详后)。这使得金大的预算总额增加,同时造成差会拨款比例下降。

从抗战中后期到战后,国民政府财政日趋恶化,国内恶性通货膨胀严重,货币迅速贬值。这造成各公私立大学面临严峻的赤字危机。而教会大学的差会拨款以美元结算,虽法币飞速贬值,但美元与法币的汇率逐年升高,故战后差会拨款占总收入比例大幅上升。当时教育部视察人员指出:1939至1940年金大的岁入“因曾在外国有基金之募捐,以外汇关系,经费颇为充裕”。<sup>①</sup> 总之,差会拨款及基本金利息在很大程度上能缓解货币贬值对学校造成的影响。

差会向金大提供的基本金由在美国的托事部(创始人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金陵大学委员会<sup>②</sup>)保管,基本金利息由托事部按期汇拨金大会计主任发放。<sup>③</sup> 从表1可知,金大的基本金收益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并不是很高,但收益数额比较稳定。1921年北京政府派员视察金大,认为该校经费出于基本金者(即基本金利息)不高,但“教会团体之捐助尚属可靠”。<sup>④</sup> 这笔“捐助”就是各差会的拨款及提供的教师薪水。

关于差会提供的教师薪金部分。金陵大学的教员分中国籍和外籍,教员薪金有两个并行的来源渠道:一是各合作差会支付本差会派出教职员的薪水;二是校方支付聘任教职员的薪水,包括中籍和外籍教职员。前者相对固定,而且数额要比后者高。这是教会大学长期以来中外籍教职员薪水存差距的原因之一。例如,1931—1932年度各差会提供教员薪水(单位:墨洋)如下:<sup>⑤</sup>

北浸礼会(农学院):2位(人名不详),5 460.00

美以美会:章文新(F. P. Jones),5 250.00;伊礼克(J. T. Illick),4 725.00;史德蔚(A. N. Steward),5 250.00。

长老会:卜凯(J. L. Buck),4 158.00;唐美森(J. C. Thomson),5 208.00;梅赞文(S. J. Mills),5 250.00;(另两个名额空缺)。

基督会:贝德士(M. S. Bates),3 822.00;史迈士(L. S. C. Smythe),5 150.00;(另三个名额空缺)。

同年,在中籍教职员中,年薪超过3 000元的有校长陈裕光以及刘乃敬、李小缘、吴景超、陈纳逊等8位教授。其中,农学院院长谢家声薪水最高,为3 600元。他们的收入与差会派出教师仍有差距,其他中籍教员的年薪更要差一大截。而其他外籍教职员亦无薪水超3 000元者。<sup>⑥</sup> 所以相较于其他教职员,上列差会派出的几位教授所得可谓“顶薪”。各差会提供的教师薪水是保证师资质量的重要一环。近代各教会大学中有相当数量较为出色的外籍教员能在华长期执教,正得益于此。

<sup>①</sup> 《视察私立金陵大学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5—1997。

<sup>②</sup> 1945年6月,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在美国成立。1946年5月14日,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金陵大学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该委员会取代创始人委员会。参见 *Minutes of Annual Meeting, University of Nanking Committe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May 14, 1946)*, UBCHEA, Reel 57. Box 191. Folder 3330.

<sup>③</sup> 教育部编:《中国第一次教育年鉴·丙编》,第101页。

<sup>④</sup> 《教育部视察金陵大学报告》,《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第26页。

<sup>⑤</sup> *Budget for the Year July 1, 1931—June 30, 1932*, 金大档649—2387。

<sup>⑥</sup> *University Payroll List for Budget of 1931—1932*, 金大档649—2355。

关于常规拨款部分。各合作差会的常规拨款由托事部以美元拨付,数额大致恒定。不过,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这笔经费亦受影响:一方面是收入减少,另一方面是美元兑换成中国货币数额减少,如 1933—1934 年度,金大本部赤字达 22 856.61 元,归因于来自美国的各项捐助和差会拨款减少。<sup>①</sup> 不过,到抗战中期,金陵大学来自美国的经费因外汇关系显得比较充裕。<sup>②</sup> 从战后开始,差会拨款比例上升(见表 1),成为金大维持预算收支平衡的重要支柱。

值得注意的是,按规定各差会年度拨款有定额,但历年预算并不完全照此。1933—1934 年度,美以美会向大学拨款 788 美元,向大学医院拨款 371 美元,合计 1 159 美元;长老会向大学拨款 3 240 美元,向大学医院拨款 720 美元,合计 3 960 美元;基督会向大学拨款 1 500 美元,向大学医院拨款 562.50 美元,合计 2 062.50 美元。北浸会在创始人会和校董会各拥有 2 名代表,该年度它专门向农学院拨款 1 500 美元。1929 年修订的《金陵大学总章程》规定,完全合作差会每年须向金大拨款 3 300 美元,在创始人会和校董会各拥有 1 名代表的部分合作差会每年须向金大拨款 1 000 美元,在创始人会和校董会各拥有 2 名代表的部分合作差会每年须向金大拨款 2 000 美元。<sup>③</sup> 不过在这一财年,除了长老会,其他 3 个合作差会对金大的拨款均少于规定数额。尽管各差会每年的拨款未完全按定额实施,且该项收入的年度预、决算亦存差额。在 1927 年之前,这笔款项收入大致稳定。见表 2。

表 2 金陵大学差会拨款及基本金利息预决算比较表 单位:墨洋元

年度	预决算	基本金利息	差额	差会拨款	差额	差会薪水	差额
1923—1924	预算	17 575.00	524.68	27 000.00	0	62 420.00	- 593.10
	决算	18 099.68		27 000.00		61 826.90	
1924—1925	预算	17 575.00	1 455.88	31 000.00	- 4 000.00	58 720.00	5 999.80
	决算	19 030.88		27 000.00		64 719.80	
1925—1926	预算	22 200.00	- 835.48	31 500.00	- 4 500.00	62 720.00	0
	决算	21 364.52		27 000.00		62 720.00	

资料来源:预算资料见 UBCHEA, Reel 90. Box 230. Folder 3882—3883;决算资料见 UBCHEA, Reel 90. Box 230. Folder 3887。

差会的拨款数额不仅取决于其自身财政状况,而且还与当时中国时局有关。很多时候,差会拨款的预算常不能完成,特别是“南京事件”后的几年与抗战初期,实际拨款常大幅少于预算数。1927 年 3 月“南京事件”发生后,金大进入办学以来最危急的时段,<sup>④</sup>致使 1927—1928 财年成为金大预算最为困难的一年。1928 年 6 月 30 日的司库报告显示,这一年度基督会的拨款因汇兑原因减少至 691.56 美元,美以美会减少至 2 376.33 美元,北浸会的拨款尚不明确,而长老会压根就未拨一分钱。<sup>⑤</sup> 该年决算报告显示,北浸会提供 2 000 美元,<sup>⑥</sup> 该财年结束之后才补齐款项。美以美会认为削减年度常规拨款是必要的,<sup>⑦</sup> 这就意味着该会削款成为常态后,金大的收入将减少。在该财年,因差会拨款减少以及其他基金减少造成的赤字,校董会只得通过中国渠道弥补。<sup>⑧</sup>

① *Record of an Informal Meeting of the Committee on Policy (October 12, 1934)*, UBCHEA, Reel 58. Box 193. Folder 3354.

② 《视察私立金陵大学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 5—1997;《教育部令(高字 43012 号)》,1940 年 12 月 25 日,金大档 649—4。

③ *Constitu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April 22, 1929)*, 金大档 649—2296。

④ 蒋宝麟:《20 世纪 20 年代金陵大学的立案与改组》,《近代史研究》2016 年第 4 期。

⑤ *Report of Treasurer (ending June 30, 1928)*, 金大档 649—2382。

⑥ *Financial Statement (June 30, 1928)*, 金大档 649—2382。

⑦ *Minutes of The Third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June 28, 29, 1928)*, UBCHEA, Microfilm, Reel 58. Box 192. Folder 3343.

⑧ *Report of Treasurer (ending June 30, 1928)*, 金大档 649—2382。

从20世纪30年代起,金大从中国方面获得的经费日渐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弥补美国方面,特别是差会拨款的不足。1936年9月,陈裕光在赴美访问时向创始人会报告:“在1930—1936年间,除了学费之外,来自中国方面的经费及捐款达法币1 251 000元,而来自对华工作的美国机构的经费是403 000元,前者是后者的3倍;在最近几年,金大从中国方面获得的经费要多于其他在华的基督教学大学。”<sup>①</sup>

全面抗战爆发后,各教会大学的经费十分紧张,而且来自中国方面的经费骤然减少。中国基督教学校董联合会(The Associated Board of Trustees of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经济委员会在1938年5月的报告中称:学生入学人数锐减,故学费收入急剧下降,中国政府的拨款也不能确定,而来自中国团体和个人的捐助几乎减少到零。为缓解战时教会大学的经济窘境,1937年秋,校董联合会在美国成立支持中国教会大学的全国紧急委员会,发起筹款活动,在1937—1938和1938—1939两个年度进行,1940年后该筹款活动被纳入范围更广的“联合援华会”(United China Relief)活动中。<sup>②</sup>金陵大学内迁成都后,创始人会即开始向该校提供“应急经费”(Emergency funds),从1939—1940年度起此笔款项改称“维持经费”(Sustaining funds)。此项经费数额大大高出基本金利息和差会拨款,亦由创始人会拨发。在抗战前中期,金大所获应急经费/维持经费与差会总拨款数额大体相当,而到抗战后期,此款数额大增(按美元计,法币因大规模贬值,无法准确判断),成为金大在战时得以维持的重要经济保障。参见表3。

表3 抗战时期金陵大学应急经费/维持经费与差会总拨款数额比较表 单位:美元

年度	应急经费/维持经费	差会总拨款	比率
1937—1938	38 041. 92	26 567. 61	1. 43:1
1938—1939	33 528. 22	26 070. 77	1. 29:1
1939—1940	25 304. 25	25 885. 98	0. 98:1
1940—1941	16 500. 00	27 859. 67	0. 59:1
1941—1942	47 902. 71	28 760. 90	1. 67:1
1942—1943	127 650. 00	23 373. 94	5. 46:1
1943—1944	176 618. 82	21 400. 19	8. 25:1
1944—1945	186 773. 16	28 448. 28	6. 57:1

资料来源:金陵大学历年财务报告及决算表,UBCHEA, Reel 90. Box 230. Folder 3890—3891; Report of the Treasurer Trustees University of Nanking Year Ending June 30, 1945, UBCHEA, Reel 57. Box191. Folder 3329。

说明:所列差会各项拨款不包括鼓楼医院部分。差会总拨款项包含霍尔基金(Hall Fund)利息收入。

抗战结束后,联合援华会对金陵大学拨款得以延续。1945—1946年度,金大获维持经费132 537. 93元(美元),<sup>③</sup>1946—1947年度,联合援华会对金大拨付994 436 526. 00元(法币),1947—1948年度以校董联合会特别拨款的名义拨付10 920 000 000. 00元(法币)。<sup>④</sup>

### 三、中外捐助与学科发展

除了差会拨款和学生学杂费两项大宗外,金陵大学的经费来源还有来自中外个人和团体的捐助。而这此类收入大部分有指向性,即资助大学内部的某一学院、学系、研究机构或开展特定的科学

① Minutes of Annual Meeting, Board of Founders, University of Nanking (September 24, 1936), UBCHEA, Reel 57. Box 190. Folder 3324.

② 详见刘家峰、刘天路《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学大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205页。

③ University of Nanking Committee Budget Analysis - 1945/46, (as of June 30, 1946), UBCHEA, Reel 57. Box191. Folder 3330.

④ Detailed Financial Report for the Year July 1, 1946 — June 30, 1947; Detailed Financial Report for the Year July 1, 1947 — June 30, 1948, UBCHEA, Reel 90. Box 230. Folder 3391.

研究计划,这对学校的发展取向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

农学院是金大三大学院之一。1914年创办的农科和1915年创办的林科,1916年两科合称农林科,1930年农林科改称农学院。在金大的3个学院中,农学院(农林科)是受外界资助数量最多,范围最广的学院。在建立之初,农林科经费无着,之后教会认识到高等农业教育在中国的重要性,到1919年农林科才进入整个大学的预算中。<sup>①</sup>

1919年9月,美国驻南京领事偕包文校长谒见江苏省督军李纯,请求补助建设改良种棉试验场费用,李氏即答应捐助1万元,山西省督军阎锡山也捐了1万元。<sup>②</sup>

1923年,美国对华赈款委员会(American Committee for China Famine Fund,亦译“中国救灾基金美国委员会”),将对华赈济余款中的约67.5万美元(一说“约70万美元”)作为基金(中国救灾基金,The China Famine Relief Fund)资助金大农林科,用产生的利息作为调查研究灾荒的原因、救济以及在中国发展农林教育之用。这笔经费,连同美国对华赈款委员会资助燕京大学的经费,由美国特设的托管会保管,产生的利息供两校农学院专用。<sup>③</sup>该项经费收入列入金大1924—1925年预算。1933年,中国救灾基金与金大的10年合约到期后续约,基金交由金大创始人会保管和支配。<sup>④</sup>从数额上看,赈余基金要超过整个金大合作差会提供的基本金,为农学院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在金大农学院的院史上,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与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合作进行的“全国土地利用调查”计划引人注目。太平洋国际学会有研究中国土地问题的计划,而金大农学院农业经济系亦有相关研究,系主任卜凯的《中国农家经济》(Chinese Farm Economy)一书是当时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优秀著作。于是双方达成协议由金大农经系进行“全国土地利用调查”计划,而太平洋国际学会则筹集研究资金。从1929年至1937年,该计划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每年约1万美元的资助。<sup>⑤</sup>

美国赈余款基金和洛克菲勒基金是两项维持时间较久、数额较多的资助。农学院接受中外机构的捐款、补助和合作研究经费的名目繁多。据统计,抗战前与农学院有合作关系的国内外机关有22家。<sup>⑥</sup>显然,这些合作的内容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针对性。各方的捐助既保障了农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和推广工作的经费,也对其定位和发展规定了方向。

此外,霍尔基金(Hall Fund)及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对金大亦有数量可观的常规性捐助。霍尔(Charles M. Hall)是美国铝业企业家。他逝世后,留下巨额遗产,其中有一部分用于资助国外教育事业。1925年,哈佛大学申请到霍尔基金的资助,与燕京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旨在与中国的研究机构合作研究中国文化。1928年,霍尔遗产董事会提出美国国外教育基金的分配方案。这笔经费超过1400万美元,扣税后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760余万美元分配给霍尔遗嘱中指定的东方地区20所研究机构,包括6所中国教会大学,其中金大获60万美元;第二部分640万美元,其中450万元作为哈佛燕京学社的一般性经费,另190万美元按比例分配给6所中国教会大学和印度阿拉哈巴德(Allahabad)农业研究所,<sup>⑦</sup>其中金大获30万元,专用于中国文化研究,专设“中国

<sup>①</sup> 《教育部视察金陵大学报告》,《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第26页。

<sup>②</sup> 《南京快信》,《申报》1919年9月17日,第2张第7版。

<sup>③</sup> 《中国救灾基金美国委员会致美国总统及捐款人的最终报告(1923年8月1日于纽约)》,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美国花旗银行在华史料》,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年版,第567—568页;过探先:《金陵大学农林科之发展及其贡献(摘要)》,《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第263页。

<sup>④</sup> “University of Nanking Controls China Famine Relief Fund”, *China Weekly Review*, Vol. 67, No. 2, December 9, 1933, p. 68.

<sup>⑤</sup> 《25年来金大农业经济系之概述(摘要)》,《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本校作全国土地利用调查》,《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第268、270—271页。

<sup>⑥</sup> 《农学院概况》,《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第259—260页。

<sup>⑦</sup> 张寄谦:《哈佛燕京学社》,章开沅、[美]林蔚主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146页。

文化研究所”。<sup>①</sup> 概言之,霍尔基金对金大的资助分两部分:30万美元基金的利息直接交由金陵大学;30万美元基金利息通过哈佛燕京学社专门拨付给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

哈佛燕京学社拨付经费给6所教会大学(之后又有华中大学加入)以发展中国研究(国学)事业。哈燕社特别强调受资助的大学必须有效地把经费用于提高中国语言、文学和历史的教学与研究水平。它最经常性的工作就是对经费的使用提出建议和进行监督。最初,哈燕社对各教会大学研究事业的指导和管理并不严格,从1934年起逐渐加强。在当时,它把受资助的7所教会大学分为两类,燕京大学是一类,致力于学术研究和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其他6所大学为一类,都以加强文史哲本科教学为主。<sup>②</sup> 这就意味着接受哈燕社资助的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不能开展研究生教育事业。与前述美国赈余基金相似,哈燕社对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的资助体现了较强的指向性,但同时包含较强的限制性,否定开展研究生工作是限制的核心。

193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各校成立研究院所,从事研究生教育的依据。翌年,国民政府公布《学位授予法》,于是研究生和学位问题获得解决。从这一年起,国内各公私立大学相继申请研究院或研究所,为数甚多。<sup>③</sup> 同年,教育部开列了一个有资格从事某一专业研究生教育的大学名单,其中有两所或三所私立大学,包括金陵大学。金大的历史、化学和农业经济3个系被准予办理研究生教育。鉴于此,金大校董会授权校方扩充这3个学系,但并不增加现行预算,除非今后有其他特别经费补充。<sup>④</sup> 可以说,校董会对研究生教育的态度是办事不花钱。

在校董会批准开展研究生教育后,校董会执行与经济委员会决定由校方向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联合会说明1936—1937年度来自哈燕社基金的预算情况,包括3个学院的本科教育以及由教育部批准的3个学系的研究生教育。<sup>⑤</sup> 几天后举行的校董会年会,向创始人会提出办理国学特别研究班(special graduate course in Chinese)。<sup>⑥</sup> 1936年4月22日,创始人会召开年会,宣布哈佛燕京学社不支持金陵大学开设任何中国研究(国学)领域的研究生专业,或把哈燕的经费用于这方面。<sup>⑦</sup>

尽管如此,金大校方于1936秋新学年开始时招收研究生(其中化学专研究部业招生6名,农业经济研究部专业招收4名),并计划于1937学年招收史学研究部的历史专业研究生。<sup>⑧</sup> 而国学特别研究班实则于1934年秋即开始招生。<sup>⑨</sup> 同时,当时正在美国的陈裕光也与哈燕社和创始人会就研究生教育问题进行沟通。哈燕社仍表示不同意金大开设研究生课程,而且不会对此进行资助。而高等教育参事会批准金大开设历史和化学两个研究生专业。最终,创始人会授权校董会批准金大可颁授历史学文学硕士学位和化学理学硕士学位。<sup>⑩</sup> 哈燕社也表示支持金大招生史学研究生。<sup>⑪</sup>

<sup>①</sup> 《本校中国文化研究所之来历》,《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第59页。

<sup>②</sup> 陶飞亚、吴梓明:《基督教学与国学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191页。

<sup>③</sup>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全国高等教育概况》,杜元载主编:《革命文献》第56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71年印行,第152—153页。

<sup>④</sup> Eighteenth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November 21, 1935), UBCHEA, Reel 59. Box 194. Folder 3356.

<sup>⑤</sup> Twenty-seventh Meeting of the Executive-Finance Committee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March 14, 1936), UBCHEA, Reel 59. Box 194. Folder 3357。按: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联合会成立于1932年,最初由10所教会大学托事部合作组成,1935年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加入,1937年沪江大学加入。各享受哈燕社资助的大学预备各自的年度预算和总预算时,要详细陈述哈燕社捐助金及其他类似资金的去向,分别提交给校董联合会和哈燕社,哈燕社接纳各校申请前,必须征询或参考校董联合会的意见。参见肖会平《合作与共进:基督教学合作组织对华活动研究(1922—1951)》,第92—95、364页。

<sup>⑥</sup> Nineteenth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March 20, 1936), UBCHEA, Reel 59. Box 194. Folder 3357.

<sup>⑦</sup> Minutes of Annual Meeting, Board of Founders, University of Nanking (April 22, 1936), UBCHEA, Reel 57. Box 190. Folder 3324.

<sup>⑧</sup> Report of the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September, 1936), UBCHEA, Reel 59. Box 194. Folder 3358.

<sup>⑨</sup> 《金陵大学增设国学特别研究班》,《中央日报》1934年6月30日,第2张第4版。

<sup>⑩</sup> Minutes of Annual Meeting, Board of Founders, University of Nanking (November 18, 1936), UBCHEA, Reel 57. Box 190. Folder 3324.

<sup>⑪</sup> 陶飞亚、吴梓明:《基督教学与国学研究》,第199页。

作为教会大学,金陵大学的捐助款有一大部分来自国外或外国在华机构团体。但由于向南京政府立案之后被贴上私立大学标签,金大从中国方面获得捐助的渠道和数额愈益增多。近代中国私立大学校董中的商界人士往往是学校的“金主”。1928年,因学校经费赤字,金大校方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透支25 000元,用于当年夏天的开销。<sup>①</sup>而当时上海银行董事长陈光甫正是该校改组后的新校董会董事。1933年,上海银行资助金大农学院农业经济系设立两个客座教席,聘请英美专家各一人,并合作办理乌江经济事业,并设置奖学金。<sup>②</sup>1934—1935年度,上海银行资助金大的预算为23 000元,由于缺少该年度决算资料,实收数不得知;1935—1936年度预算30 000元,实收25 636.58元;1942—1943年度预算100 000元,实收100 000元;1946—1947年实收3 000 000元。<sup>③</sup>这些数字不仅显示出上海银行对金大的资助力度,亦体现陈光甫个人与金大的深层联系。1947年5月22日,金陵大学在复员回南京后重新召开校董会会议,选举陈光甫为董事长。<sup>④</sup>

#### 四、政府补助经费与政策导向

在近代中国,政府的补助是私立大学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政府的经费补助并非划一,不同的私立大学在不同的时期所受补助的力度和范围有很大差异。自晚清时期教会学校创办之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与政府没有经济往来。进入民国后,教会学校是否应该接受中国政府资助之议兴起。20世纪20年代初,巴敦调查团(China Educational Commission)来华调查基督教教育事业时指出:若教会学校受政府资助必须忠诚服务,但政府不能对该校的教学自由加以限制。<sup>⑤</sup>

在北京政府时期,作为教会大学,金陵大学几乎与中国的教育体制隔离,但这并不代表其不接受官方的资助。当时,金大与北京政府和一些地方政府有若干零星的合作而获补助。农林科成立后,正好北京政府农商部设立的林业学校解散,该校的学生转入金大农林科学习,农商部补助该校3 000元;山东、安徽、云南和江西四省政府送官费生到农林科学习,1920年秋山西省派遣19名学生到农林科学习。<sup>⑥</sup>在当时,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尚无对未立案的外人办学机构进行制度性的经费补助。

1927年“南京事件”后中美两国政府进行善后交涉,为表示友好,美方免予中国政府应向金陵大学赔偿的30万元。<sup>⑦</sup>1929年,国民政府决定将此30万元捐赠金大建造图书馆。不过,此事迁延日久,直到1931年蒋介石任行政院院长时才令财政部筹拨这笔款项。至1933年春,财政部拨发第一批10万元,同年秋拨发第二批10万元,1935年底再拨发最后10万元。<sup>⑧</sup>这是国民政府对金陵大学给予的一笔特殊捐助。金大校董王正廷时任外交部部长,对促成此事功不可没。<sup>⑨</sup>

<sup>①</sup> *Minutes of The Third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June 28–29, 1928)*, UBCHEA, Reel 58. Box 192. Folder 3343.

<sup>②</sup> 《农学院概况》,《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第260—262页;张振江、任东来:《陈光甫:一个被遗忘的外交家》,《读书》1999年第12期。

<sup>③</sup> *University of Nanking Revised Budget for 1934–1935; University of Nanking Budget for 1935–1936*, UBCHEA, Reel 90. Box 230. Folder 3385; *Working Account for the Year ended 30th June, 1936, University of Nanking Budget 1942–1943 Revised November 1942*, 金大档649—2390; *Detailed Financial Statement for the Year July 1942–June 1943*, UBCHEA, Reel 90. Box 230. Folder 3891; *Minutes of Board of Directors (November 25, 1947)*, UBCHEA, Reel 59. Box 194. Folder 3365.

<sup>④</sup> 《校董会举行会议,公推陈光甫杭立武先生任正副董事长》,《金陵大学校刊》第364号(1947年5月31日)。

<sup>⑤</sup> 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编:《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44页。

<sup>⑥</sup> 私立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室编印:《私立金陵大学农学院概况》第2号,1933年印刷,第26—27页。

<sup>⑦</sup> 《宁案损失调查》,《申报》1928年10月26日,第4张第13版。

<sup>⑧</sup> 《国府拨发余款十万元捐建本校新图书馆,明春元旦后可具体进行建筑》,《金陵大学校刊》第178期(1935年12月23日)。

<sup>⑨</sup> 《金陵大学第十六届校董会纪录》,1934年11月23日,金大档649—223。

1928年金陵大学向南京国民政府立案后成为政府认可的私立大学,而此时国民政府正开启对私立大学进行常规性补助的制度之阀。193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私立大学、专科学校的奖励办法,对已立案私立大学、学院和专科学校中办学优良者,由中央或省市政府酌量拨款补助。<sup>①</sup>从1934年财政年度起,教育部每年拨发72万元补助已立案的优良私立专科以上学校,1937年度起增至120万元,该项列入中央教育文化经费预算,受补助的学校逐年递增。<sup>②</sup>

1934年教育部发布补助私立专科以上学校的通令后,金大即请款246 750元,最后教育部核准下拨数为3万元。<sup>③</sup>二者数额相差颇大。此款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补助文学院14 000元,其中8 000元设置“经济学”和“中国边疆问题”两个教席,6 000元用以补助“中国边疆问题”的研究设备;二是补助理学院16 000元,用于购买设备。<sup>④</sup>此后,教育部一直给予金陵大学补助经费。

教育部对私立大学的补助经费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经常补助费,系常规性质,主要用于设置教席、购置设备及图书等用途;第二类是临时(特别)补助费,主要用于校园建筑或补贴教职员生活;第三类是教育部与学校开展合作研究或委托办学的经费。以上三类补助,在金陵大学均有涉及。表4列出历年教育部补助金大的常规及临时经费数据。

表4 金陵大学历年收入中的国民政府教育部补助经费(经常、临时) 单位:元

年度	教育部补助预算	教育部补助实收	教育部补助占总收入比(%)	总收入
1934—1935	30 000.00	—(不详)	—	—
1935—1936	26 737.00	34 237.00	3.56	962 545.59
1936—1937	30 000.00	30 000.00	2.16	1 386 751.20
1937—1938	35 000.00(26 350.00)	26 249.00	2.86	916 708.47
1938—1939	26 950.00	20 000.00	—	—
1939—1940	33 000.00	—	—	—
1940—1941	54 500.00	—	—	—
1941—1942	79 500.00	527 113.05	8.82	5 979 720.93
1942—1943	332 000.00	310 336.53	2.95	1 052 5261.86
1943—1944	290 000.00	444 942.00	1.76	25 282 513.66
1944—1945	—	3 899 980.00	3.51	111 122 736.79
1945—1946	—	2 300 000.00	0.77	300 406 798.00
1946—1947	54 000 000.00	22 500 000.00	0.78	2 903 139 646.37
1947/7—12	460 000 000.00	760 000 000.00	1.13	67 432 649 654.73
1948/1—6	150 000 000.00	—	—	—
1948—1949	20 000.00	—	—	—

资料来源:预算数据见金大档649—248,2382,2383,2384,2385,2386,2387,2388,2389,2390;《教育部补助费本校得六千万元》,《金陵大学校刊》第362号,1947年4月30日,第1版;《教育部已核定本校二十四年度补助费》,《金陵大学校刊》第163号,1935年9月9日,第1版;《二十四年度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补助费详数》,《申报》1935年7月13日,第4张第15版;《教育部核定专科以上校补助费,共计八十六万元》,《申报》1937年7月8日,第3张第12版;Summary of Revised Budget for 1937—1938, UBCHEA, Reel 59. Box 194. Folder 3361;《教育部拨发本校临时补助费》,《金陵大学校刊》第318号,1943年3月15日,第2页。决算数据见金陵大学历年财务报告及决算表,UBCHEA, Reel 90. Box 230. Folder 3886—3891,以及金大档649—77,2310,2384,78。

说明:单位元,1934—1935年度为银元,1936—1937年度起用法币,1948—1949年为金圆券。本表所列教育部补助费不包含合作研究、委托办学经费及学生资金。

<sup>①</sup> 《教育部订定私立大学、专科学校奖励与取缔办法(1930年8月2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页。

<sup>②</sup> 《十年来之高等教育(1940年)》,杜元载主编:《革命文献》第56辑,第196页。

<sup>③</sup> 《教育部补助本校三万元》,《金陵大学校刊》第129期(1934年9月10日)。

<sup>④</sup> Sixteenth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November 23, 1934), UBCHEA, Reel 58. Box 193. Folder 3354;Report of the College of Arts (November 23, 1934), UBCHEA, Reel 58. Box 193. Folder 3354.

由上可见,历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对金大的经常及临时补助费占该校收入的比例并不很高,但比较稳定。抗战中后期和内战时期教育部补助经费比重减少,与当时通货膨胀、法币迅速贬值有关。然而,这两笔款项对金大的经济状况常能起较关键的作用。就在教育部宣布补助私立专科以上学校的同时,金大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1933—1934年度,由于从美国方面所获收入减少,金大本部的赤字额达22 856.61元,附属中学赤字达10 427.13元。<sup>①</sup>如此,1934—1935年度的经费缺口会十分大。而国民政府对私立大学进行经费补助,正可对弥补赤字起到重要作用。在内迁时期,金大受捐助的渠道和经费减少。除了创始人会提供的特别拨款外,教育部的补助费也是维持学校稳定的重要经济保障。战前教育部的补助费专用于添设教席和添置设备,鉴于战时面临实际困难,教育部准予部分经费挪移,作为建筑校舍之用。<sup>②</sup>例如,1942—1943年度金大获教育部补助费20万元,其中1/3至1/2款额可用于提高教职员待遇,或生活津贴。<sup>③</sup>从1940—1941年度起,教育部又向私立大学拨临时补助费,教职员的薪俸可在此项中支援。<sup>④</sup>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大学生有许多来自沦陷区,经济来源几乎断绝。为此,教育部于1938年2月5日颁布《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规定公立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家在战区,费用来源断绝,经证明须接济者可向政府申请贷金,贷金分全额、半额两种,学生毕业后3年内偿还所贷之款。1943年8月,教育部又颁布《非常时期国立中等以上学校及省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规定公费生办法》,规定自1943年度起新生改行公费制。公费分甲、乙两种,甲种公费生免学费和膳食费,并可获得其他补助费;乙种公费生仅免学费和膳食费。这就意味着,相比贷金,享受公费者不需偿还所享经费。另一个重要变化是私立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亦能享受公费。抗战胜利后,因内战延续,公费制依旧实施。<sup>⑤</sup>1942—1943年度金大即获得教育部贷金778 710.58元,1943—1944年度贷金(公费)2 156 010.45元,1944—1945年度贷金(公费)9 250 833.92元,1946—1947年度贷金(公费)323 266 350.00元。<sup>⑥</sup>贷金(公费)亦属教育部补助。

相较战前,教育部对金大的补助力度越来越强,名目越来越多,金大对教育部的各种补助经费依赖越来越深。而金大校方对此的心态可能是复杂的。1942年陈裕光赴美考察时,在创始人会年会上发言称,由于和政府机构的合作加深,金大从中国方面所获的经费越来越多,但他质疑从政府处得到如此多的财政补助对金大是否有益。<sup>⑦</sup>此意恐怕更多是在特定的场合下对特定的人所发。至少就实利层面而言,金大校方对教育部补助费多是目盼心思,屡次向部方求款求助。此时,校方多淡化其教会和外国背景,而更多强调本校为“私立大学”,经费筹措不易,故“伏祈钧部优于补助”。<sup>⑧</sup>

有时,金大向政府求款还要颇费思量。1947年6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吴贻芳“得可靠消息”,国民政府正在计划追加教育经费,但此时联董会发起13所基督教大学联合募捐正在进行,吴欲立即向教育部请款,并和陈裕光商定,二人代表上海区各校迅速向行政院和教育部请款,以免政府认为基督教会获得募捐款而影响教会大学补助费。他们获悉,行政院和教育部答应在补助全国私

<sup>①</sup> Record of an Informal Meeting of the Committee on Policy (October 12, 1934), UBCHEA, Reel 58. Box 193. Folder 3354.

<sup>②</sup> 《教育部整顿及补助私立专科以上校》,《申报》1939年5月25日,第3张第12版。

<sup>③</sup> 《教育部三十一年度省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补助费,本校核定为二十万元》,《金陵大学校刊》第306号(1942年5月15日)。

<sup>④</sup> 《教育部代电》(1940年11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5—2960。

<sup>⑤</sup> 教育年鉴编辑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11辑第105号,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影印本,第52—56页。

<sup>⑥</sup> Detailde Financial Statement for the Year July 1942 – June 1943:Summary Statement of Actual Finanical Report for the Year July 1, 1943 to June 30, 1944; Financial Report, June 30, 1945; Statement of Financial Condition June 30, 1947, UBCHEA, Reel 90. Box 230. Folder 3891. 在以上决算表中,贷金(公费)项为 loans to students、students loans 或 taijing。

<sup>⑦</sup> Minutes of Annual Meeting, Board of Founders, University of Nanking (April 25, 1942), UBCHEA, Reel 57. Box 191. Folder 3329.

<sup>⑧</sup> 《金陵大学复教育部稿》,1936年5月7日,金大档649—4。

立专科以上学校费共 200 亿元内拨给基督教大学 56 亿元,以响应基督教大学募款活动。吴、陈二人再催劝联董会,不要因为教会大学已得政府大额补助而使募捐有所懈怠。<sup>①</sup> 在短时间内,教育部确认,拨给各教会大学 60 亿元补助款,由于圣约翰大学尚未立案,不准获得此款,款项由中华基督教会高等教育会议在 12 所教会大学中分配。<sup>②</sup>

然而,教育部也不是有求必应。1939 年 6 月,日军战机大规模轰炸成都,金大校舍损毁严重,陈裕光请求教育部补助 3 万余元作为建筑款或迁校费。教育部称,没有多余的经费可补助,请其自筹或向国外募捐。<sup>③</sup> 1942 年 8 月,金大以本校教职员生活津贴差额太大和添造女生宿舍为由,向教育部求助。教育部以本年度已核拨该校 20 万元,无余款可拨为由,拒绝所请。<sup>④</sup>

从国民政府的角度看,其对私立大学的补助具有体现国家权力在私立大学中现实存在和象征的双重意义。国民政府规定,私立专科以上学校必须经教育部审查后立案才能办学,立案后优良者能获国家经费补助。如此,教会大学获教育部补助,不仅昭示其立案后成为本国“私立大学”的政治属性,亦强化了国家对教会大学的统一管控。

政府对私立大学的补助,特别是教育部常规补助有很明确的导向。按规定,私立大学须将 70% 的补助经费用于添置设备和建筑校舍,30% 经费用于增聘特种科目的教席或支付原有教授的薪金,总经费的 70% 以上必须用于理、工、农、医等学科的发展。<sup>⑤</sup> 这颇能体现国民政府“重实抑文”的教育政策,<sup>⑥</sup> 这也是政府对私立大学办学方向的引导。在金大,教育部常规补助经费主要用于边疆史地、经济学、化学工程、机械工程、植病等专业的教席俸给,以及设备补助,<sup>⑦</sup> 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此外,教育部及其他政府机构、地方政府还通过合作办学、委托办学和委托研究的方式,给予私立大学若干补助,这在抗战时期的金大普遍存在。

金大设文、理、农 3 个学院,未设工学院,这与教会大学重视基础教育,轻视职业(应用)教育的传统有关。不过,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金陵大学的教学与科研愈益追求实用性,并迎合国家、社会的需要。<sup>⑧</sup> 进入抗战时期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

在抗战时期及战后,金大理学院和农学院的学系、课程设置及研究的实用倾向更加强烈,这有一个重要的背景——战时国民政府的“建教合作”方针,即“为谋教育行政与国防的生产建设事业之沟通与合作,应实施建教合作”。<sup>⑨</sup> 这使得大学更深地卷入国家政治之中,但政府机构与大学关于经费、科学研究、招生教学和毕业生录用方面的深度配合,也使实用学科在相对艰难的战时环境中探骊取珠。1942—1943 年度,金大受教育部的补助与政府(包括教育部)合作研究资助数额为:教育部经常补助费 199 600.00 元(法币);教育部临时补助费:110 736.53 元;教育部贷金:

<sup>①</sup> 《吴贻芳、陈裕光致某先生函》(1947 年 7 月 18 日),金大档 649—249。按原函无年份,从张群任行政院长(1947 年 4 月至 1948 年 5 月)判断,应在 1947 年,收信人应该是各教会大学校长。

<sup>②</sup> 《教育部(高 46271 号)》(1947 年 8 月 22 日),金大档 649—1856。

<sup>③</sup> 《陈裕光致张梓铭函》(1939 年 6 月 21 日);《张梓铭复陈裕光》(1939 年 6 月 28 日);《顾毓琇致陈裕光函》(1939 年 7 月 4 日),金大档 649—365。

<sup>④</sup> 《教育部指令(高字第 37094 号)》(1942 年 9 月 16 日),金大档 649—249。

<sup>⑤</sup> 《十年来之高等教育(1940 年)》,杜元载主编:《革命文献》第 56 辑,第 196 页。

<sup>⑥</sup> 张太原:《20 世纪 30 年代的文实之争》,《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6 期。

<sup>⑦</sup> 《教育部已核定本校二十四年度补助费》,《金陵大学校刊》第 163 号(1935 年 9 月 9 日);《教育部三十年度省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补助费,本校核定为六万一千元》,《金陵大学校刊》第 288、289 号(1941 年 4 月 10 日)。

<sup>⑧</sup> 1937 年 3 月,金大校董会讨论学校今后的发展趋向时指出:“金陵大学处在一个特别的环境中,它位于中国的首都,有大量的机会和便利与政府机构进行合作。金陵大学已采取各种方式与政府进行合作,并期待这些合作机会能够增加,并能为今后国家的发展带来变革。金陵大学必须坚持准备成为培养未来国家发展领导者的的地方。”见 *Twenty-first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March 19, 1937)*, UBCHEA, Reel 59, Box 194, Folder 3360.

<sup>⑨</sup> 《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民国二十七年四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杜元载主编:《革命文献》第 58 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当时史料编纂委员会 1972 年印行,第 29 页。

778 710.58 元；理学院项目资助：1 379 529.31 元；农学院项目资助：265 626.89 元；社会服务项目资助：9 777.00 元，小计：2 823 980.31 元。<sup>①</sup> 其中政府资助合作项目经费 1 734 933.20 元，占当年政府总拨款的 61.44%，占当年金大总收入的 16.48%。该年度农学院与各机构开展 23 项合作研究项目并获资助，其中与行政院、教育部、农林部、财政部、地政署、四川省华阳县政府及四川省训练中心的合作有 16 项。<sup>②</sup> 在战后，这种合作模式得以延续，如 1947 年整一年，金大与教育部、财政部、农林部、地政部及卫生部与各种形式的合作研究和教学项目，并获得资助。其中有部分为常设，有部分为新设。<sup>③</sup>

在抗战前，金大理学院以基础科学见长。抗战爆发后，理学院的办学转向应用科学，教研事业的工科性质越来越浓厚，该院确立的新方针是：(1) 增植理工人才，以适应国家需要；(2) 努力科学研究，以促进生产建设；(3) 推广科学教育，以增加科学常识。<sup>④</sup> 在当时，金大与教育部及其他政府机构合作办理一系列专修科、师资科和训练班等，并接受委托研究，同时金大获政府相应经费补助。以 1943 年度为例，该年单是教育部就委托金大设电机、电化、汽专、园艺专修科或师资班，以及四大学合办之英语专修科，补助费为：电机工程系 90 000 元，汽车专修科 90 000 元，电化专修科 71 250 元，园艺师资班 28 750 元，四大学合办英语专修科 90 000 元。<sup>⑤</sup> 当时，理学院与交通部在重庆合办湿电池厂，理学院院长认为此举对金大有利，可以帮助学校解决经济困难。<sup>⑥</sup> 可见，对于与政府机构的合作研究并获得经费补助，金大理学院的态度是积极的，这恐怕也能代表农学院及校方的普遍观感。

总体而言，从 1910 年建校至 1949 年，金陵大学经费虽算不上充裕，但比起某一时期某些国立大学以及一些办学失范的国人自办私立大学，其收入来源相对稳定，未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学杂费收入和合作差会的拨款始终是金大最重要和最稳定的经费来源。从 1910 年到 1949 年，金大的经费来源有两个趋向：一是除了学杂费之外，从原先单一依靠合作差会拨款到经费渠道不断拓宽，捐款和政府补助成为重要来源；二是在立案后，包括中国政府、各类团体企业和个人对金大的捐助力度越来越大，来自中国的经费数额渐超美国，至抗战爆发前，前者完全超过后者，而且南京的校董会更多地承担起筹款之责。<sup>⑦</sup> 这昭示金大从相对封闭的基督教学校朝“中国化”和“世俗化”的方向不断迈进。反过来说，经费来源的“中国化”也对其基督教性质造成重大挑战，由此带来办学定位的困惑。

各类捐款和政府补助是金大经费的重要补充，在学校面临赤字危机时显得尤为重要。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常规和临时补助是该校克服战时经济困难的重要保障。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经费来源往往体现实效性，尤其是政府的补助有很强的“政策导向”性，使教会大学的发展方向与国家需求相吻合。这对金大的生存与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并在很多方面突破教会大学的办学传统，但同时限制校方的规划自主性。

<sup>①</sup> *University of Nanking Financial Statement for the Year 1942 – 1943*, 金大档 649—2384。

<sup>②</sup> *College of Agriculture & Forestry Annual Report (July 1942 – June 1943)*, UBCHEA, Reel 59. Box 194. Folder 3365.

<sup>③</sup> *Minutes of Board of Directors (November 25, 1947)*, UBCHEA, Reel 59. Box 194. Folder 3365.

<sup>④</sup> 《魏学任院长出席国父纪念周报告抗战以来理学院之事业》,《金陵大学校刊》第 315 号(1943 年 1 月 1 日)。

<sup>⑤</sup> 《教育部核定本校各项补助费》,《金陵大学校刊》第 320 号(1943 年 4 月 15 日)。

<sup>⑥</sup> *H. R. Wei to Y. G. Chen (May 26, 1942)*, 金大档 649—2339。

<sup>⑦</sup> *First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November 29, 1927)*, UBCHEA, Reel 58. Box 192. Folder 3343.

## The Sources and Operation of Fund of University of Nanking, 1910 – 1949

Jiang Baolin

**Abstract:** University of Nanking incorporated from Methodist, Christian and Presbyterian missionary colleges was a Christian university in Nanjing in 1910. As a Christian university, funds of University of Nanking were from cooperated Mission Broads, special grants, fees and government grants. From 1910 to 1949, Mission Broad appropriations were always the most important income. The receipts reflected the nature of Christianity were the stable economic guarantee of the University. However, with the localization and secularization deepening, Chinese governments, organizations and personals gave the University more and more grants. The Chinese sources were exceeding the U. S. sources. Government grants often reflected the effectiveness and orientatio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the Christian universities in line with national needs. This played a certain role in promoting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but also limited the autonomy of the school.

**Key Words:** University of Nanking; Sources of Fund; Mission Broads; Government Grants

(责任编辑:王小嘉)

### 《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研究(初编)》出版

东北师范大学赵铁峰教授著《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研究(初编)》已由科学出版社于2017年6月出版。该书是作者探讨帝制后期,即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特质及其与现代社会的关联问题系列著作中的第一部。全书近38万字,分为4个部分,16个专题。前言阐释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研究的基本视角与核心观点,其余内容从文明史观与世界视角、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演进与政治文化等不同侧面展现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的情状。该说尝试从比较文明和结构分析的视角重新审视明清中国,认为明清中国发生了多种不可逆转的深刻变化,已经从帝制早期的帝制农业社会发展成为帝制农商社会。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明清帝制农商社会以农商并为基础,与周边及西方世界发展变动密切关联,社会分层体系有向平面化演变的动向。与此同时,帝制政治结构进一步强化,科技革命并无迹象,思想学术领域也没有形成持续的挑战帝制体系的潮流。以商品经济繁荣为突出表征的新经济社会趋势与帝制体系构成了一种互洽格局,这是明清中国社会的根本特征。该书重点是讨论明清社会结构及其变迁趋势,但理论视角贯通中国古代社会,其中作者对“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进行了深刻批评,力图从真正的“本土”视角出发,呈现和阐释中国文明、文化、社会共同体的结构模式与演进历程。(耿雪)